

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財政危機的影響，城市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受到企業經營邏輯的束縛，城市像公司一樣運營發展，公共空間越來越經濟化。作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城市居民更多地被視為消費者，而不是政治社區的公民。在這種轉變中，社會不平等加劇，弱勢群體遭到排斥。長此以往，必將導致民主公共空間的裂變與衰落。

黃鳳祝

阿爾法城市的異化

自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以來，隨着福利國家制度的式微，歐洲主要城市的住房市場被新自由化的浪潮裹挾，高檔化、紳士化以及公共空間的私有化波及社會各個階層，房源緊張，房價高企，無力負擔高房租的低收入者被迫向城市邊緣地區遷徙。在這一進程中，城市空間變化最為劇烈的當屬居於全球城市排名之巔的倫敦。

在《阿爾法城市：倫敦如何被超級富豪佔領》（*Alpha City: How London Was Captured by the Super-Rich* · 二〇二〇）一書中，英國社會學家羅蘭·阿特金森

（Rowland Atkinson）以倫敦為樣本，分析資本對城市空間與功能的異化及其後果。他把這種變化視為一種浮士德式的交易：富豪聚集，財富本身成為城市的產業，財政緊縮，公共資產被售賣，資本增值，成功的代價是窮人的生活空間遭到擠壓。

阿爾法城市的引力場

從一九九九年開始，全球化與世界城市研究網絡（GaWC）定期對世界級城市進行評估和分類。依據經濟、文化、政治和

社會標準，分為 Alpha、Beta、Gamma 三個層級，每個層級又細分為若干等級。倫敦和紐約作為 Alpha+ 城市，屹立於這一體系的頂端。

阿爾法城市用一種獨特有力的方式，把全球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利益聯繫在一起，源自資本，為資本服務。阿特金森認為，無論從財富、文化供給還是宜居性來說，倫敦都是名副其實的阿爾法城市：經由倫敦流動的貨幣，遠甚於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倫敦的社會空間結構為財富精英服務；倫敦的人均富豪數量超過紐約和東京。

倫敦作為全球超一線城市，其規模足以產生自己的引力場，吸引全球富豪來此生活、投資或是隱居。對金錢的追求，滲透並重塑了城市的空間和文化，改造舊有街區，創建新的街區，抬高房價，吸引國際資本的湧入。超級富豪擠佔富人的空間，富人侵奪中產，低收入者則被推向城市的邊緣。城市政策的制定以國際大都市的運營為導向；中產階層依附於超級富豪，被貨幣邏輯收買；窮人為富人服務，成為資本的人質。與此同時，政府對社區的公共投入減少，由於社會福利和居住空間的缺失，城市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壞，貧

富差距加劇，無家可歸的現象不斷增加。

城市功能的異化

作為現代人工作、生活、發展的聚居地，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為了滿足居民的需求。但是在阿特金森看來，倫敦正在演變成為一座為錢而不是為人服務的城市。城市為資本及其附庸服務，拋棄了廣泛的社會群體。參與阿爾法城的社交生活越來越依賴於支付能力，城市的經濟、政治、心理和更深層次的操作系統越來越以金錢為目的，而對普通居民的困境無動於衷。倫敦成為一部巨大的社會離心機，不斷吐出那些因其運作而受損的人，即窮人和不被需要的人。

阿特金森把城市功能的異化歸因於政治。二〇〇八年以來推行的新自由化政策，使倫敦走向絕對的阿爾法城市。為了給資本開闢道路，政客將公共城市市場化，通過降低稅率、調整法規、放鬆監管，提供無拘無束的經營自由和避稅可能，為資本而非為居民服務。

昔日的政客和城市管理者致力於發展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住房和交通網絡，以滿足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如今的城市精英對於社會契約和義務

不感興趣。阿特金森指出，對於超級富豪而言，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和個人化邏輯使相對平等的城市發展變得更多餘。富人如果擔心公立醫院的質量，可以尋求私人醫療；如果擔心犯罪率，可以住在有保安護衛的高牆之內；如果公立學校質量堪憂，那麼倫敦有足夠多的私立學校可供選擇。

公共空間的私有化

倫敦城市空間的裂變預言了其他城市未來的變化。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柏林、慕尼黑、維也納等阿爾法和貝塔城市，這種變化正在發生。

基於戰後德國分裂的原因，地處歐陸中心的柏林經濟發展相對遲滯，在全球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五十八位，屬於貝塔（Beta）城市。但是在過去二十年，柏林的空間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歐債危機以來，為了尋求安全的投資渠道，大批國際金融投資者轉戰德國房地產市場，高檔化問題日益突出，其中柏林的情況最為極端。房價飛漲，房租也一路看漲，自住住宅和高端住宅增加，普通出租住宅減少，社會弱勢群體的居住空間受到排擠。昔日的東柏林，居民來自社會各階層，有工人，也有藝術家，現在則是年輕中產的

天下。居住空間的分裂，加劇社會各階層的隔閡，貧富差距導致不滿情緒的累積。

公共空間被認為是現代城市的構成要素。哈貝馬斯把公共空間的出現視為民主社會的重要時刻。在倫敦，持續的私有化導致公共城市的死亡。許多泳池、圖書館、醫院、公園等核心公共設施被關閉，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公共空間的私有化和經濟化，已成為全球城市發展的普遍趨勢。

公共空間的經濟化與城市政治的新自由化密切相關。英國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把這一轉變歸因於福利國家制度的衰落。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財政危機的影響，城市政策的制定越來越受到企業經營邏輯的束縛，城市像公司一樣運營發展，公共空間越來越經濟化。作為這種轉變的一部分，城市居民更多地被視為消費者，而不是政治社區的公民。在這種轉變中，社會不平等加劇，弱勢群體遭到排斥。長此以往，必將導致民主公共空間的裂變與衰落。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